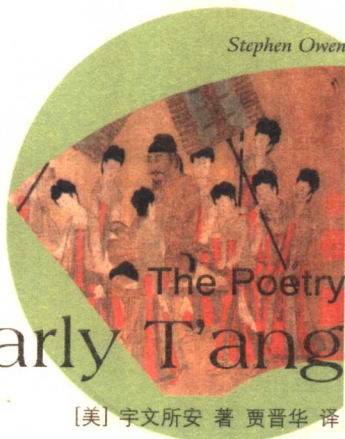


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

初唐 诗

Stephen Owen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美] 宇文所安 著 贾晋华 译



7.421

汉学研究所工作系列



初唐 诗



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

Stephen Owen

[美] 宇文所安 著 贾晋华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初唐诗/(美)宇文所安著;贾晋华译. -北京:生活·
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2

(宇文所安作品系列)

ISBN 7-108-02165-X

I. 初… II. ①宇… ②贾… III. 唐诗-文学研究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92338 号

责任编辑 冯金红

封面设计 罗 洪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邮 编 100010

经 销 新华书店

排 版 北京京鲁创业图文设计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京海印刷厂

版 次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2004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1.25

字 数 235 千字 图字 01-2004-4919

印 数 0,001-7,000 册

定 价 20.50 元

《初唐诗》、《盛唐诗》三联版序言

宇文所安

英文版的《初唐诗》和《盛唐诗》大约是在四分之一一个世纪以前出版的。那时的中国古典文学学术界和现在十分不同。那时，我们拥有基本的原材料，虽然王绩的五卷本诗文集直到1987年，也就是《初唐诗》出版十年之后才面世；那时，很多诗文集的笺注本都还没有问世，我们也还没有傅璇琮等学者就作者生平和诗歌编年作出的重要研究成果。现在的电子文献把检索字词变得非常容易，给研究工作带来了极大的方便，而在二十五年前，这一切都是不可想像的。那时，我们缺乏现有的种种研究工具，只能依赖清代和民国时期的学术成就。最重要的是，在过去的二十五年中，中国学术获得了长足发展，唐代研究领域精彩纷呈，令人欣慰和鼓舞。

《初唐诗》、《盛唐诗》有它们的局限、错误和缺点。如果能够重写，它们一定会很不一样。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我所利用和借鉴的学术研究，都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不过，即使在多年之后，我相信书中的一些基本论点和对文学史采取的视角仍然不无其有效之处。

文学史不是“名家”的历史。文学史必须包括名家，但是文学史最重要的作用，在于理解变化中的文学实践，把当时的文学实践作为理解名家的语境。我们不应对一个长达百年的时期进行大刀阔斧的概括，而应该检视较短的时期，作家群体，不同的区域。这样一来，传统的学术研究，比如说交游考、年谱，就会和文学史写作以及理论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获得崭新的意义。文学史试图把具体细节和对整体的理解与把握联系在一起，而整体的复杂性总是使简单的概括显出不足。

在对诗歌的研究里，学术工作的惟一目的就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具体的诗篇。好的文学史总是回到诗作本身，让我们清楚地看到诗人笔下那些令人讶异的、优美的、大胆的创作。

最后，我要向这两本书的译者贾晋华教授表示衷心感谢：如果三联书店认为这两本著作在二十多年后的今天还值得在中国再版，那么，功劳有一半属于贾教授。

2004年8月

序

傅璇琮

自从欧洲的第一批耶稣会士抱着传教的虔诚，越过重洋，在明朝末年来到中国，开始接触中国的社会和文化，西方学者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识和研究，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过程。如果按照《国际政策的文化基础之研究》作者诺思罗普（F.S.C.Northrop）所说，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分歧不在于政治而在于文化，这种分歧深深植根于各自传统的不同概念之中，那末，四百多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固有精神和价值的探索，实际上可以说是两种或两种以上文化的互相认识和补充。这也构成了近代世界史上文化交流的丰富繁复的图像。尤其是作为东方大国的中国，它的悠久的历史文化被世界所认识，以及这种认识的日益深化，本身就是文化史上令人神往的课题。从这个背景上说，宇文所安先生的成名作《初唐诗》被介绍到中国来，它的意义就不仅仅是中国学术界增加一本优秀的汉译名著，而且还在于它是文化交流的链条中一个十分引人注目的环节。

在探索西方学者对中国文化的认识过程中，我们不应该忘记马克斯·韦

伯 (Max Weber, 1864-1920)。他的思想和著作日益受到中国读书界的注意,特别是近几年显得十分突出。是他扬弃了在他之前的欧洲学者的共同学风,即服从于自己的时代背景和相应的要求,按照西方人的思想模式来理解中国的社会和 cultural 的发展;正是从韦伯开始,主张应当密切联系社会历史的实际状况来研究观念的形成和演变轨迹。这就为尔后的研究开辟了一个新的格局,那就是要对中国的文化真正有所了解,就应当探求中国传统文化产生、发展的历史背景,努力依循中国人的思想方式来进行课题的研究。这种情况,特别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学者那里,表现得更其明显。

关于美国学者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就我所看到的材料,美国密执安州立大学人文系及语言学系教授李珍华博士的《美国学者与唐诗研究》(载《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第一辑,1983)是最清楚、概括的一篇。这篇文章讲的虽然是美国的唐诗研究,实际上足以反映美国于本世纪50年代以来汉学研究的巨大进展。我们只要比较一下上一世纪同一时期法国学者对中国那些平庸的言情小说《平山冷燕》、《玉娇李》的推崇,和本世纪近三十余年来美国学者(包括美籍华人学者)对唐诗、宋词及明清小说的认真探讨,相距真不可以道里计。日本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往往以绵密的材料考证见长,而美国在这方面却常以见识的通达和体制的阔大取胜。

正是从李珍华先生的文章中,我知道了宇文先生在唐诗研究中取得的成就。李珍华先生把宇文先生列为美国的中国文学研究的第三代学人。而称为“特别值得一提”,并推许出版于1977年的《初唐诗》为“一本杰作”,说“把整个初唐诗作一系统性处理,欧氏可以说是第一人”。^①李珍华先生对欧洲文

① “欧氏”指斯蒂芬·欧文,宇文所安的另一中文译名。——译者注

化与美国文学均有深邃的认识，而又对唐诗，特别是初、盛唐诗有较深的把握，因此我想他的话是可信的。由于我参与《唐代文学研究年鉴》的编辑，较早读到其中的文稿，因此李先生特别提及的宇文先生著作给我的印象很深，并盼望能早日见到全书的中文译本。现在依靠贾晋华女士的努力，这个愿望得以实现，甚感欣慰，我想我们国内的唐诗研究者也会从这一译著中获得启发。贾晋华女士前数年从厦门大学周祖谟先生研治唐代文学，她的硕士学位论文论论皎然《诗式》及大历时期江南诗风的特点，也给我很深的印象，她的从文学演进的内部规律与外界社会文化思潮相互影响的研究，与宇文先生的治学，也确有不谋而合之处。以贾晋华女士对唐诗所具有的修养来从事于本书的翻译，必能准确达原书的胜义，这应当是无可怀疑的。

在过去一个很长时期中，初唐诗的研究在我国整个唐诗研究中是一个极为薄弱的环节。初唐，如果把下限定在睿宗时，那就是足有九十年的光景，占了唐代历史的三分之一。如果对于这一阶段文学研究不足，就不可能充分说明盛唐的高潮。对这九十年时期的文学，过去的论著往往只停留在一个笼统的认识，细节研究非常缺乏，这种情况在最近四五年内才有所变化。作为近体的律诗，到底是经过什么样的轨迹一步步地成熟的？古诗，特别是盛唐、中唐时一些大家所擅长运用的七古，怎样从南北朝的涓涓细流，经过初唐作家的多方尝试和大胆变革，而汇成长江大河，这中间有什么规律和经验可求？由“四杰”而陈子昂，而沈、宋，是怎样一步步递嬗演进的？当时的社会思潮、文化氛围给予诗人和诗风以什么样的影响？初唐时期几个帝王的宫廷政治和文化生活，赋予文学风格以什么样的特色？这些，都需要做细致的分析。而近几年来我国初唐文学研究的进展，也正是在这些方面作出了令人瞩目的探讨。从这一研究的历史背景来看，宇文先生作于1977年的这本

《初唐诗》，在中国学者之先对初唐诗歌做了整体的研究，并且从唐诗产生、发育的自身环境来理解初唐诗特有的成就，这不但迥然不同于前此时期西方学者的学风，而且较中国学者早几年进行了初唐诗演进规律的研求。虽然近几年来中国学者的论著在不少方面已作了深入的挖掘，大大加快了初唐文学研究的进程，但宇文先生的贡献还是应该受到中国同行的赞许的。

我们高兴地看到，在《初唐诗》之后，作者又于1981年出版了《盛唐诗》，更进一步论述了初唐与盛唐的关系，并对盛唐诗人作了使人感兴趣的分类（如把张说、张九龄、王维作为“京城诗人”，把孟浩然等作为“非京城诗人”，把王昌龄、高适、岑参作为处于两者之间的诗人，“京城诗人”多用律体，“非京城诗人”多用古体）。宇文先生近年来的研究格局似更为放开，由论述诗歌创作进而研讨诗歌理论。他说他更强烈地感觉到诗歌中那些无法为文学史所解释的方面；他仍然相信文学史是基本的，但它需要由对诗歌的其他方面的探讨来补充。为此，他又撰写了关于中国诗论的论文，结集成八篇文章，起名为《中国传统诗歌和诗论：预言的世界》（威斯康辛大学出版社，1985）。紧接着又是一组八篇文章的集子：《追忆：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往事再现》（哈佛大学出版社，1986）。他自己说这八篇文章是一种反系统的处理，将互不相关的作品放在一起考察，尝试着使单篇的诗作和散文焕发出生命力。这样做，作者也抱着一种希望，这就是打破美国的中国文学狭窄的阅读圈子，寻求更多的读者。

宇文先生的学术著作在其已经完成尚未出版的《中国文学思想读本》中，^①更有新的进展。他认为，过去大部分论述中国文学理论和批评的英文著

^① 此书由哈佛大学出版社于1992年出版。——译者注

作，都倾向于运用现代西方文学理论的术语，而在他的这部近著里，却试图向英语读者表明，作为中国诗歌基础的概念和趣味，与西方是不同或不完全相同的；各种传统的文学思想都具有伟大的力量，但是这些力量是各不相同的。宇文先生的这一认识的确值得赞许，这是对不同民族文化传统充分尊重的态度，只有持这种态度，才能达到真正清晰的理解。这是一个严肃的学者在独立的研究中摆脱西方习以为常的观念所必然产生的结果，是一个富有洞见的认识。

近十年来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已取得可观的成绩。但人们对研究现状仍不满意，这种不满意是多种多样的。在我所接触的一些研究者中，越来越感到对古典文学的研究结构需要有所反省，这就是说，研究结构存在不合理的情况。有些课题投入的力量多，成果却并不多，许多情况下往往是一窝蜂，赶热门，结果却出现了不少缺门，这就必然影响总体水平的提高。这是一个需要详细论证的问题，不是这篇短序所能承担的。由宇文先生的著作，使我进一步感到，作为古典文学研究结构中的问题之一，就是我们对国外学者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现状的了解，是多么的不够。我相信，在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其他一些地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有价值的著作，一定还有不少，它们以不同的视角来审视中国的独特的文学现象，定会有不少新的发现，即使有的著作有所误失，也能促使我们从不同的文化背景来研究这些误差的原因，加深我们的认识。如果我们能有计划地编印一套汉译世界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代表作，肯定会受到中国学术界和读书界的欢迎，也将会对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结构起到积极协调的作用，这是我个人作为研究者之一所深深期望着的。

致中国读者

宇文所安

从事任何学术工作，首要的是牢记各种局限：研究者本身的局限，及其所研究的学术类型的局限。回顾这部写于许多年前的书，我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各种局限。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中国出版了许多关于初唐诗的出色论著，而我在撰写这部书时，却未及从这些论著中获益，这是十分遗憾的。但是另一方面，这些同样的局限也给了我自由，使我得以从崭新的视角观察这一时期；如果我是在今天撰写关于初唐的书，那就肯定要困难得多。各种学术传统对于同样的问题可以给出不同的答案，它们都建立了极大的发展趋势。年轻学者一旦进入这样一种传统，往往难于避开那些公认的问题。然而，有时却有必要提出新问题，或以新的方式阐述旧问题。在学习和感受中国语言方面，中国文学的西方学者无论下多大功夫，也无法与最优秀的中国学者相并肩；我们惟一能够奉献给中国同事的是：我们处于学术传统之外的位置，以及我们从不同角度观察文学的能力。新问题的提出和对旧问题的新回答，这两者具有同等的价值。

前面提到的第二种局限是研究者所从事的学术类型的局限。与各种学术传统一样，各个研究者在他们的著作中也建立了一种发展趋势。我在文学史上研究得越多，就越意识到我正在反复对自己提出相同的问题。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诗歌的某些方面具有中心的意义，而其他方面却黯淡无光。但是这些其他方面往往正是诗歌的“诗歌”。文学史和我个人对它的描述也可能变成一种局限。

在文学论著中，如果我们自己的思维习惯已经变得太轻快自如，那就很有必要脱离它们。文学论著所传达的不仅是一种认识的结构（例如，文学史的一种模式），而且还包括个别学者完成这一结构的途径：发现的兴奋，思考解决问题的方式。在学术著作中，就像在文学作品本身一样，任何优秀的读者都能够辨别出作者从呆板的、学术的程式中获得的快乐。我在撰写这部书和关于盛唐的那部书时，就感到了这种快乐。但是，即使是最出色的认识结构，如果成了惯例和陈套，就会变得呆板乏味。脱离自己辛苦获得的成果是十分可惜的，但又是必要的。

因此，近年来我一直将文学史搁在一旁，试图精细地探讨中国诗歌那些无法为文学史所解释的方面。对于诗歌来说，文学史就像是“门厅”，人们只有通过它才能到达诗歌；但是，它本身并不理解诗歌。我希望有一天将带着新的视野回到文学史。

我撰写这本书的初衷是为盛唐诗的研究铺设背景，但是我却发现，初唐诗比绝大多数诗歌都更适合于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研究。孤立地阅读，许多初唐诗歌似乎枯燥乏味，生气索然；但是，当我们在它们自己时代的背景下倾听它们，就会发现它们呈现出了一种独特的活力：从公主宴会上洋洋得意地呈献的包含完美对句的一首诗，到陈子昂的大胆论辩。在阅读作品时补上这

个背景，既需要学识，也需要一种想像的行动，一种“它在当时应该是什么样”的强烈感觉。当我们确实阅读中补充了这样的背景，初唐诗就不再仅仅是盛唐的注脚，而呈现出了自己特殊的美。

我衷心感谢贾晋华女士为翻译这本书所作的努力。我希望这本书至少能够向中国读者表明：中国诗歌的爱好者遍于全世界。

康科特，马萨诸塞，1987年1月11日

初唐年表

- | | |
|---------|-------------------------------------------|
| 618—626 | 高祖 |
| 627—649 | 太宗 |
| 650—684 | 高宗（655年立武则天为皇后） |
| 684 | 中宗（即位仅一月就被其母武后废黜） |
| 684—690 | 睿宗（即位约两月就被武后放逐，武后继续以其年号摄政） |
| 690—705 | 武后，武则天（690年正式废黜睿宗，改国号为周） |
| 705—710 | 中宗（第二次即位。武后引退，复周为唐，韦后及其家族不久就掌握政权，710年鸩中宗） |
| 710—712 | 睿宗（第二次即位。依靠临淄王、即后来的玄宗而复辟，712年让位） |
| 712—756 | 玄宗（756年后与肃宗共称帝，但实际上已退位） |

导 言

中国诗歌史上的初唐时期，从公元618年唐朝建立开始，大致延伸至713年玄宗即位时。初唐诗歌本身并没有呈现出统一的风格：它只是结束了漫长的宫廷诗时代，缓慢地过渡到新的盛唐风格。在七世纪所发生的变化中，宫廷诗的传统处于中心。“宫廷诗”在这里特指南朝后期、隋及初唐宫廷的诗。虽然在此前后，宫廷中也作诗，但只有在五世纪后期及六七世纪，宫廷才真正成为中国诗歌活动的中心。在这一时期里，不但作于各种宫廷场合的诗篇在现存集子中占了很大的比例，就是那些写于宫廷外部的诗篇中，鲜明的“宫廷风格”也占了上风。

到了七世纪前半叶，宫廷风格日益变得矫揉造作、刻板严格；强烈的对立潮流得到了发展，或修正宫廷风格，或寻觅替代的诗风。随着诗人们越出宫廷诗所严格控制的题材和场合，诗歌的主题范围开始扩大。此外，宫廷诗严格的修饰技巧对于创作过程的刻板控制也减轻了。通过这些变化，加上其他一些方式，七世纪后期、八世纪初期的诗人在保留旧风格许多优点的同时，迈向了新的自由。

文学自由应该从反面加以定义：必须先有一个标准和惯例的背景，作为诗人超越的对象。从七世纪后期起，宫廷诗的各种惯例所发挥的正是这样一种功用：形成一组能够为较出色的诗人用来表达其自由的诗歌期待。八世纪中叶的诗歌，即盛唐诗，经常被描绘成“直率”、“自然”，然而这些特性从来不是文学的内在本性。盛唐诗歌之所以呈现出这些特性，是由于有七世纪诗歌作为比较的背景。

这本书研究的就是这些标准化的惯例，以及初唐诗人如何突破它们，如何学会利用它们为自己的目标服务。虽然这里的研究局限于初唐诗，但是这些同样的标准化惯例也形成了八九世纪诗歌的隐蔽背景。八九世纪的诗人甚至比初唐后期的诗人更善于运用这些惯例和传统，尽管他们并不喜欢初唐诗。他们赞美作于宫廷诗时代之前的作品，因为那些作品体现了“古风”。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上，他们依靠的仍然是发展于七世纪的处理法则。

八世纪对初唐诗的偏见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目前，甚至在中国和日本，有关初唐诗的研究论著寥寥无几。现存的论著主要是关于个别诗人或声调格律发展的研究。较大部头的文学史著作通常只限于确认这一时期的重要诗人，及注意初唐诗风与南朝诗风的关系。没有人试图对这一时期进行广泛的、整体的探讨，或追溯此时期在诗歌方面发生的重要变化。

这一研究不得不略去最有意思的两个诗集，即寒山和王梵志的诗，至少是其中写于初唐的部分。这一删略是很可惜的，但却是必要的，因为这两个集子中的作品离开诗歌传统的主流太远，而且在创作日期及作者归属方面呈现出许多问题，如果考虑这些问题，势必会偏离对这一时期实际的文学史问题的讨论。此外，也没有迹象表明他们的作品曾为当时的京城诗人所了解。另一位诗人王绩的作品，表面上看与寒山、王梵志的作品相似，却包括在这

部书里，这是由于他的作品表现对于宫廷诗传统的自觉排斥。我还将刘希夷和张若虚忽略不计，他们的作品准确地说属于八世纪初期，但他们却经常被误认为初唐诗人。^①

这里需要说明本书正文及译文的一些凡例。由于量度在诗歌中极少被精确运用，所以我随意地以英制不精确地代替汉制，例如将“一里”译成“一英里”。我保留了中国人计算年龄的体制，即婴儿一出生就是一岁。我还把中国的阴历纪年转换成大致的西历纪年，例如景隆三年十二月，准确地说已经进入710年，却仍然称为709年。

与任何试图包括大量资料的著作一样，我不得不保持最低限度的注释。对于诗中的典故成语，只有在对本书的论述有益，或必须了解诗篇的字面意义时，才加以解释。中国诗歌的文本往往是综合性的。如果有现成的校注本，如陈子昂的诗，我通常加以采用。《文苑英华》所录经常是现存惟一的、最早的原始文本，但其质量众所周知是很粗劣的。在没有其他早期文本的情况下，我用《文苑英华》的文字校正《全唐诗》，除非《全唐诗》纠正了明显的讹误。我所引用的本文，往往综合了数种原始资料。除非出现特殊的问题，我将不讨论各种异文。为了方便那些需要查找各种早期文本及其他未翻译诗篇的读者，我根据平冈武夫等编纂的《唐代的诗篇》，^②标出了《全唐诗》的编码数字。

① 参看程纪贤 (Cheng Chi-hsien)，《唐代作家张若虚的诗歌作品之结构分析》(巴黎：Mouton, 1970)，页12-13。

② 平冈武夫、市原亨吉、今井清编，《唐代的诗篇》(京都：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64-1965)。此书中译本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1991年出版。——译者注